

热历史

古代学子毕业季的仪式感

每年的6月~7月,是学生们毕业的日子。学子毕业,代表着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,同时昭示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启。

无论古今,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。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“毕业”?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、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?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?

古代学子的毕业标准

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,古代学子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期限。夏商时期的学校制度无史料可考,西周“官学”——国学的学制,朱熹在《大学章句序》中有记载,当时的学生八岁进入“小学”学习“六艺”,十五岁入“大学”,培育道德素养、学习“修齐治平”之道。至于学子们何时毕业,《近思录》中说:“古之士者,自十五入学,至四十方仕,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,又无利可趋,则所志可知。”这些学子们需经过长达25年的学习生涯,直到40岁才能踏入仕途,但这并不意味着25年就是固定的毕业期限,因为并非所有“大学”学子都能够步入仕途,相当一部分没有入仕的学子,即使学习的时间足够,也不能算是“毕业”。

西汉武帝时,在都城设立“太学”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,立“五经博士”为教官,教授学生儒家经典。

“太学”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二:一是由太常进行选拔,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:“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,仪状端正者,补博士弟子。”二是各郡县地方高级官员推荐,“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,敬长上,肃政教,顺乡里,出入不悖所闻者,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,二千石谨察可者,当与计偕,诣太常,得受业如弟子”。这些学子经荐举进入太学后,每年参加固定的考试,成绩优异者即可取得做官的资格,“能通一艺以上,补文学掌故缺;其高第可以为郎中,太常籍奏”,从而顺利“毕业”。结合西周官学与汉代太学不难看出,科举制度出现以前,在政府官学学习的学子们不论年龄长幼,亦不论学习时间长短,从学校毕业的唯一标准就是入仕为官。

隋唐以降,随着科举制度兴起,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也在逐步完善。唐代有六大官学,皆隶属于国子监,对所招收的学生有年龄规定:“凡生,限年十四以上,十九以

下。”针对学习不同儒家经典的学子,官学也规定了不同的修习年限,如果学生没有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,将被除名。对于在官学或地方私学就读的广大学子来说,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。此时,他们毕业的标准由“入仕”转为“及第”,而每一届科举考试也就成为了这些学子们的“毕业考试”。

宋承唐制,在唐代科举的基础上增设殿试一级,学子们只有通过殿试才能真正称之为毕业。明清时期,基本延续了这个标准,而又有其时代特点。此时,考中进士仍是学子“毕业”的正途,但因国子监监生的地位提高,学子们即使没有考中进士,只要进入国子监继续读书并通过考核,也能够取得做官的资格。清代还开设博学鸿词、孝廉方正等制科,作为选拔“非常之才”的不定期、非常规考试。但不变的是,学子们的毕业标准仍是入朝为官。

古代学子的毕业礼

中国古代,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,科举中式、入朝为官,成为学子们的毕业标准。对于古代学子而言,十年寒窗苦读,一朝金榜题名,这才算真正“毕业”,是登科学子人生之大事,从学子到学校、官府都视之为举足轻重的大事而欢庆。

那么古代学子的毕业礼都包含着哪些庆祝活动呢?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设以来,至明清时期,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逐步成型,中国古代学子们的毕业礼也就围绕着这些重要节点展开。

自隋唐到明清,按照科举体制,中国古代学子们通过解试(即乡试)成为举人,并于次年赴京参加省试(明清时称为会试)。在解试放榜后,地方官员便会为这些举子们举行盛大的“鹿鸣宴”,庆贺他们通过解试,同时也预祝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省试中“高中”。“鹿鸣宴”是脱胎于周代“乡饮酒礼”的一种宴会形式,这类宴会多演奏《诗经·鹿鸣》以助兴,“鹿鸣宴”之名由此而来。比起传统的、并不十分规范的“乡饮酒礼”,“鹿鸣宴”增加了《诗经》的演奏环节,更具文化品位和“敬老”“尊贤”的文化功能。

唐代,在会试放榜后,新科进士要结队拜谢会试主考官以感谢其拔擢之恩。五代人王定保编纂的《唐摭言》记载了初始的唐代学子

们谢恩的情形,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拜谢流程:首先,由新科状元带领及第的进士们前往礼部列队而立,报上姓名,等待谢恩。接着,状元在主事的引导下与主司(即主考官)互相行礼并致谢辞,随后学子们依次向主司行拜谢礼。三日后,再行一次拜谢礼,这次主司可以和进士们交谈,并一一指出他对进士们的引荐之处,进士们则对其提携表达感谢之情。新科进士们等到皇帝的敕命下来,就要前往中书省,完成拜见宰相的仪式——过堂。面见宰相的流程与拜谢主考官类似,仍由状元致辞感谢宰相的栽培,随后状元以下的进士们一一报上姓名并致谢意。

宋代,殿试正式成为科举建制。学子们在会试之后还要经过殿试才能正式成为进士。为了防止结党营私,宋代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向主考官和宰相谢恩,所有进士及第者均为“天子门生”,此前流行的“谢恩”“过堂”等礼仪也都变为由新科状元率领及第进士上谢恩表,朝谢皇帝。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续了这一礼仪。明清两代又在进士中选取优良者点庶吉士,进入翰林院学习。清代,新科进士们先行朝谢,之后前往国子监拜谒祭酒和司业,国子监祭酒和司业则在“彝伦堂”为这些新科进士们举行“簪花”仪式,可视为清代学子的毕业典礼。这与今天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时的“拨穗”仪式,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新科进士们结伴游览京城名胜也是毕业礼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唐代,进士放榜多在春季,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多选择在长安附近踏青。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民间组织“进士团”安排出游活动,最常见的去处就是长安周边的曲江,游览之余还可在曲江之滨举行宴会。唐代的进士还偏爱游览长安郊外的慈恩寺大雁塔,进行“雁塔题名”。在雁塔之下,同年的新科进士们推举擅长题字者进行题名,如果题名者日后成为朝中高官,就需要用朱笔将其重写一遍,以示尊荣。此外,唐代的进士们在曲江宴后,又会“移饮于杏园,行探花之举。”所谓探花,就是在同科进士中选择年纪较轻者作为“两街探花使”,骑马采摘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大园林的名花。宋代一度延续了“探花”活动,但神宗熙宁年间还是以“以厚风俗”的理由废止了宴席“探花”的传统。《《人民论坛》杂志》

名人轶事 严谨治学的司马光



▲运城博物馆“宗臣史家司马光”展区

记者 刘亚 摄

□郑学富

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浩繁,君主无法全部浏览,于是他撰写《通志》八卷,呈献给皇上。宋英宗看了十分高兴,下令置局秘阁,让他继续写这部书。后来宋神宗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自撰写《序》。

司马光在洛阳买了一块地,命名为“独乐园”,既是司马光的寓所,又是《资治通鉴》书局所在地。司马光让工匠在园中挖了个大坑,砌成一间地下室,作为写作之所,美其名曰“壤室”。

司马光夜以继日,通宵达旦,他怕睡过了头,耽误编书,特意叫人用圆木做了个枕头,木枕又圆又光又滑,稍稍一动,头即落枕,人便惊醒,继续起来伏案编写。后人称此枕为“警枕”。

司马光耗费19年的时间,终于完成了中国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。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:“臣今筋骨癯瘠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,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,尽于此书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,统一修辞,故文字优美,叙事生动,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,历来与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。《资治通鉴》于叙事外,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,又以“臣光曰”的形式,撰写了史论118篇,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和历史观点,对历史上有关图谶、占卜、佛道等宗教迷信,采取了批判的态度,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。

(《天津日报》)

史海钩沉 柳宗元是书法家

□易先根

柳宗元不仅是唐代的文学家、思想家,而且还是出色的书法家。他的至交挚友刘禹锡在《伤愚溪三首》中的第二首便称颂他为草圣,其推崇的程度已为至高无上。“草圣数行留坏壁,木奴千树属邻家。唯见里门通德榜,残阳寂寞出樵车。”诗前有序,曰:“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,得胜地,结茅树蔬,为沼(水旁加止),为台树,目曰愚溪。柳子没三年,有僧游零陵,告余曰,愚溪无复曩时矣。一闻僧言,悲不能自胜,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。”

很显然这里的“草圣”便是尊称柳宗元。草圣,是指精于草书而又取得很高成就的人,即是说柳宗元精于草书,并且在草书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这绝不是刘禹锡因了友情而故作溢美的褒词,而是实际情况如此,据实所做的笔录。关于这一层意思,有与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赵璘所著《因话录》可证,该书卷三称柳宗元“尤长于章草,为时所宝”。这恐怕称得上办证了。赵璘指明柳宗元的书法是章草,而且用一个“宝”字说明了其成就之高。这一“草”一“宝”,恰好与刘禹锡的“草圣”相符。证明这一点,更重要的证据还是至今永州朝阳岩石壁上仍留有柳宗元之《渔翁》一诗的摩崖石刻的重模,因为它用的字体正是章草,这与赵璘的记述正相吻合,决不是偶然的,足可铁证。这是柳宗元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唯一真迹,其价值弥足珍贵。

(《永州日报》)



▲南山生态体育公园柳宗元雕像 记者 刘亚 摄



▲运城市西建·天茂国宾府小区“孔孟学堂”亭 记者 刘亚 摄